

英烈小传

杀敌英雄姚殿同

□金光道

姚殿同是仁风镇姚家村人,生于1893年,卒于1975年。他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民,却有着惊天动地的传奇。他曾只身一人英勇杀敌的故事,人们至今还在广为流传。

1937年12月29日,三个日本鬼子一个带刀、两个持枪,大摇大摆来仁风街骚扰。一进街,鬼子耀武扬威横行霸道,激起民愤,人们纷纷操起棍棒器械迎头痛击。有人称姚大架子的村民熊腰虎背,身大力不亏,搏斗中杀红了眼,举起武器就杀了一个鬼子兵。另外两个鬼子抱头鼠窜,仓皇逃命,一名向西跑去,一名向北逃去。持械扛棍的群众齐声呐喊,穷追不舍。

往北逃窜的,是那个带刀的鬼子官。众人愤怒的追喊声使他吓破了胆,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,犹如丧家之犬拼命狂奔,很快跑出仁风北街,窜进了麦地里,一路往北……北边一里地,就是姚家村。

当鬼子官跑到姚家村时,让村民姚殿同撞个正着。鬼子官还指望这个人能救他一

命,露出一脸苦笑欲上前巴结,不料姚殿同怒火顿起,冲着鬼子官大骂了一声。鬼子官只好拔腿又跑,姚殿同扛起锄头奋起直追。鬼子官像遇到猎人的兔子慌不择路,逃出村子又往东疯跑,跨过一道道沟坎,又越过一片片农田。后边的姚殿同也是两腿生风,紧追不放。

姚殿同是个种地的农民,尽管年纪轻轻,可从没训练过赛跑,所以追到高家村时,他仍然追不上。姚殿同急中生智,从高家村借了一匹骡子,也把锄头换成了红缨枪,紧接骑上骡子又追。一直追到惠民县黄新庄,他才追上了鬼子官。

右臂上见了血,是刀伤,却纵身一跃,向鬼子官扑去。两人抱成一团,在地上翻来滚去,姚殿同与鬼子官展开了殊死搏斗。突然,姚殿同看见了旁边的东洋战刀,一个猛劲儿翻起身,将鬼子官压到身下。

庄稼人缺少少穿,就是不缺力气。年轻力壮的姚殿同骑在鬼子官身上,一手摁住他的脑袋,一手握紧了拳头,冲准鬼子官的眼睛狠狠地拳击。鬼子官“哇啦哇啦”惨叫,抱头求饶。姚殿同打着打着,鬼子官就没了动静。姚殿同站起来,又踢了一脚,鬼子官“哼唧”了一声。

姚殿同愤怒地喘着粗气,举起了日本鬼子的战刀。大刀向鬼子官的头上砍去!砍去!再砍去!姚殿同一连砍了三刀,刀刀见血。鬼子官这个中国人民的死敌,一命呜呼见阎王去了。

从那时起,仁风一带的广大群众纷纷传颂着:姚殿同,真是勇敢杀敌的大英雄!

民间传说

诗救才子

□何志书

也许是出于对张穆若先生的喜爱吧,在老百姓中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关于穆若先生的曲折离奇的故事,打油诗救江南才子宋振涛便是一个。

有一天,张穆若先生来到了博山。经朋友介绍,认识了当地做瓷猫非常有名的李老汉。在李老汉家里,先生看到到处摆满了烧制好的瓷猫,一个个活灵活现,像真的一样,感到非常高兴。先生又来到制作毛坯的地方,拿起两块泥做的毛坯一对,嘴!严丝合缝,就凑成了一个瓷猫的毛坯。看着看着,先生好像想起了什么,眉头皱了皱,然后拿起一根小木棍儿,在一片还没干的毛坯里面,写了几行字。李老汉也没看写的什么,等这片毛坯干了以后,就与另一片合成一个完整粘好,刷上瓷釉,画上图案,烧制成了一只瓷猫,和其它瓷猫一块儿被瓷器贩子运到江南去卖。

话说江南有个才子名叫宋振涛。这个宋才子出身名门,是个有学问、有修养、品格高尚的人。可他命运不济,偏偏摊上了一个好吃懒做、风流招摇的婆娘。这一天,宋振涛到街市上去逛,一眼看中了瓷器店里摆着的李老汉烧制的瓷猫,就买了一个回家,晚上睡觉枕在头上。不料想,到了晚上睡得正香的时候,两只老鼠跑到床上打起架来。宋振涛一看,猛地一翻身,不小心把瓷猫划拉到地上摔碎了。宋振涛心疼得不得了,多半夜没有睡着觉。第二天起来打扫的时候,却发现有一个瓷片写着字,拿起来仔细一瞧,上面是一首打油诗:

瓷猫本是博山烧, 卖给江南宋振涛, 两只老鼠来打架, 便把瓷猫打碎了。

宋振涛一看,大为惊奇!心想,这人竟然能算到这只瓷猫卖给我,绝对是高人!我一定要找到他,见识见识他到底是何等人物!于是,他从瓷器店打听到瓷器贩子,从瓷器贩子打听到博山,从博山打听到李老汉,费尽周折又从李老汉那里打听到了穆若先生,前前后后用了半年多,历尽了千辛万苦。先生知道宋振涛是至诚君子,又听宋振涛叙说了寻访自己的经历,心中很是感动,就留宋振涛住了下来。两人一起谈经论史,联句赋诗,纵论天下,谈笑风生,相处十分融洽,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特别是宋振涛,对先生简直是奉若神明,言听计从,毫不含糊。

俗话说,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过了一段时间,宋振涛要走了。穆若先生知道留不住,就亲自送他上路。临别之际,先生送给宋振涛一封信,信上又是一首打油诗:

走路莫走沟, 点灯莫梳头, 一斗谷三升米, 等待苍蝇抱笔头。

见宋振涛眼中存有疑问,先生脸色凝重,嘱咐道:“天机不可泄露,到时自知。只是性命攸关,贤弟切不可大意!”

辞别先生,宋振涛踏上归程。走着走着,下起了大雨。雨停之后,宋振涛来到一座石桥边,见桥头的路被大雨冲坏了。上不了桥,他就想从桥下的沟里穿过去。刚下到沟底,忽然想起先生走路莫走沟的话,就又退了回来。刚回到岸上,就见那座桥轰隆一声塌了下来。宋振涛心说:好玄哪!不由地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闲话少说。不久,宋振涛回到了家里。就在他走后的这些天里,他那风流媳妇就红杏出墙,和村里的屠夫康七鬼混到了一起。到家的时候已是傍晚,宋振涛在家门前正好碰到了康七,只见他一脸酒气,眼神怪怪的,仿佛是刚从自己家里出来。上前一敲门,却见妻子一步三扭地开门迎出来,还哆嗦气地说:“死鬼!刚出去就回来了?”定睛一看是她的丈夫,竟一句话没说,自个儿回到屋里。

进得屋来,只见桌上杯盘狼藉,酒气熏天。宋振涛猛然想起康七满脸酒气的样子和怪怪的眼神,什么都明白了。他也懒得和那婆娘吵架,挥笔写下一封休书。那婆娘放下了不是,不但不低头认错,反而认为丈夫好欺负,大吵大闹起来。宋振涛不再理她,点上灯,坐在窗前,准备梳理好发髻上床睡觉——这是他多年的习惯。就在这个时候,他猛然想起了穆若先生点灯莫梳头的嘱咐,就吹灭了灯回到床沿儿上坐下来。这时他婆娘正在床沿儿上坐着,见宋振涛坐过来,就赌气坐到了窗户跟前儿的椅子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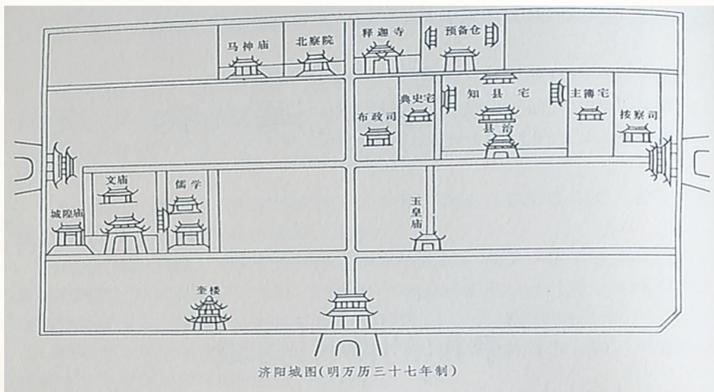
再说康七,回到家里越想越气,越想越急。宋振涛这一回来,就再也捞不着和那小娘们儿风流快活了,不行!得除掉他。俗话说,色胆包天。这康七借着酒劲,顺手拿起一把尖刀,就来到宋振涛家窗户跟前,正好看见宋振涛在窗前梳头。一会儿灯灭了,康七趁黑闯进屋内,对着窗前的黑影就是一刀!只听一声尖叫,那婆娘倒在了血泊里。康七一听是女人的叫声,知道杀错了人,吓得逃跑了。

第二天,宋振涛被带到了县衙。那县官本是个糊涂蛋,死认定是宋振涛杀了妻子。宋振涛哪里肯招认,可他一介文弱书生,如何受得了严刑拷打?万般无奈之下,只得屈打成招。县官儿见人犯有招,就叫书记好好记下。这时怪事发生了!只见一只苍蝇死死抱住笔头,书记一个字也记不到纸上!见此情景,宋振涛一下子想起穆若先生的诗来!他慌忙说:“我知道是谁杀了人了!是同村康七!”知县问他:“你如何知道?”宋振涛便从怀里拿出穆若先生的信来,并说:“一斗谷三升米,可不就是糠(康)七么?”知县至此方才明白过来,忙派人将康七抓获。用刑一问,康七便招认了与宋妻勾搭成奸,误杀逃窜的事实。

案情大白,知县宣布宋振涛无罪释放;康七奸淫人妻并杀人致死,判处死刑,打入死牢,待秋后处斩。事后,知县大为折服,感慨万分:“张穆若未卜先知,真神人也!”

史海钩沉

早期的济阳县城



最早的济阳县城,始建于公元1129年即金代天会七年九月,是第一任县长组织实施的,距今已890年。济阳的第一任县长(时称知县,下同)名叫康端。他上任后,就筹划组织县城的建设。当时,因条件所限,只是建了个县城的大致轮廓。从规划到施工,总共才用了40多天的时间。主要是建筑起了一堵城墙,使县城有了个里外而已,城内的建筑寥寥无几。建起的城墙,周长四华里,高、宽都谈不上什么宏伟。城墙外挖护城壕一道,深

约八尺,为挖土筑城墙所致。在城墙的东、西、南三面各修有城门,分别命名:东叫“仁风门”,西名“泰和门”,南称“清阳门”。三座城门上都建有城楼,远远望去,亦显城池的模样。

县城建后的第八年即1136年,第二任县长徐弼上任。他见城里尚无有县衙而发出感叹:本县有集镇、村庄,管理着18400多户人家,城街集市都看得过去,唯独没有县署,实在让人不好瞧。就像一个人,身穿衣裳,佩戴

饰剑,前看打扮合适,只有未戴帽子光着头一样。我们怎么能这样继续下去!于是,徐弼向上级官呈送请求修建县衙的报告,经批准于第二年(1137年)十月开始调集工匠动工。用了一个多月时间,便将县衙建成:“吏舍宾馆,狱区库局,无一不具;公堂燕室意象轩轩,直出临境之右。”公堂宿舍,仓库牢房,县衙办公需要的房舍都具备了,而且建筑的气派好像还胜过了临县。

过了200多年,到明代成化年间,第十五任知县张镗任职期间,将县城城墙加高到二丈八尺,加厚到基宽二丈,顶宽一丈。第十六任知县张端,疏通城内水道,将积水引入城壕,并围城种植柳树数千株,使城池得以绿化。到万历三年(1575年)第四十五任知县秘自谦时,把土城墙更换成了砖墙。

万历十九年,为防备倭寇海盗的袭掠,第五十一任知县蔡惟忠,组织力量环城建起防敌台15座,台上各筑一座碉堡。万历三十七年,第五十七任知县在任期间,又对城墙进行了修葺,挖浚了城壕。城内的县衙,也历经元代的杜涛、董珍、马天铎,明代的张镗、张端、侯加乘,清代的解元才等任知县的组织修葺或扩建,使其更具规模了。方位在今公安局西邻县人大、政协家属院址,坐北朝南;完整时有谯楼(城门上的望楼),仪门,正堂,问事厅,吏、户、礼房,布政司,按察司,寅宾馆以及大、小库房若干间;另有知县宅、主簿宅、典史宅各一所。城内及城外附近,还有监狱,演武场,文庙,医学,僧会司及祠坊等亭楼建筑。县城的风貌,已是焕然一新了。

(据《济南区域文史存珍·济阳县卷》)

历史典故

孝义二张氏

□李惠广

旧时代,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毫无权利可言,不用说的,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,连自己的姓名权都没有。她们自出生到出嫁,在娘家只有一个乳名,到婆家这乳名也不得叫了。如果需要称谓时,就只能以娘家的姓来称为“某氏”,有姓而无名。甚至连姓也保不住,还常常要在自己的姓前面冠以夫家之姓,自己的姓也只能被降级使用了。譬如某女娘家姓马,夫家姓牛,那她就是“牛马氏”了。只因普通女性无名,本文要说的这两位张姓女士,就算她们的姓不被降级使用,也只能称之为“张氏”了,谁叫她生在封建社会呢?

先说的一位张氏是明末清初人,丈夫王宏谦家住白杨店(今属垛石街道),是济阳县的名士王琢璞(无瑕先生)之子。张氏自十七岁时嫁入王家,勤劳俭朴,孝顺知礼,深得家人的喜爱和街坊的称赞。可惜她人好运气不好,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,丈夫就染病去世了。这时张氏上有八十多岁的祖母和五六十岁的公婆,下有未离地的幼子,老人孩子需要她来照顾,生计家务需要她来打理,肩头的担子大大超过了常人。

张氏孝养老人勤谨周到,亲切耐心,孝顺之名闻于乡里。祖母年届耄耋,饮食起居诸般事情都靠她来料理。一

年三百六十日,不管寒冬夏热,春燥秋湿,都把老人服侍得熨熨贴贴,称心如意。祖母和婆母相继去世后,张氏又专心侍奉公公。无暇先生疾患在身,四肢挛曲行动极



其不便,又因是位饱学的儒士,十分讲究礼数,而且脾气也不甚好,伺候起来很不容易,时时处处都要小心翼翼。即便这样,张氏也以勤快和细心,将这位残疾的老人服侍得心情愉悦,肢体少受了疾患的许多折磨。

明末,清兵多次袭入关内烧杀掳掠。

一次,一支清兵攻破济南北撤时路经济阳,百姓闻风而逃。张氏一手抱着孩子,一手搀扶着公公,跌跌撞撞地逃到杜家水口桥(即今垛石桥村)时,被清兵赶上,把她的儿

官看来是仁义之士,问明她要自尽的原故,很是敬重她的为人,便给了她一面小旗,让她举着到附近清兵的驻营处去寻找孩子。她到了兵营中果然找到了孩子,兵士们见到她举着的小旗,竟不予阻拦,任她把孩子抱走。孩子找回来了,公公也已镇静下来,他们又逃向别处去了。

后来,张氏一面奉侍公公,一面督促儿子王期读书。王期进学成为秀才后,无瑕先生也就心满意足地寿终正寝了。再后来,王期的儿子王亦也考中了秀才,父子二人继承了张氏孝顺的美德,对老人加心服侍。张氏安享晚年之福,八十三岁高寿而终。

另一位张氏是王希文之妻。王希文字西伯,清乾隆时期济阳县某庄人。其家境富庶,为人仗义疏财,亲友街坊凡有求帮借贷者,毫无吝嗇,慷慨相助,因而被乡邻誉为“王善人”。

王希文原配妻子病歿后,续弦张氏。张氏聪慧美貌,处世通情达理,与丈夫性情相投,鱼水和谐,二人感情笃厚,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无奈祸福无常,好景不常。数年的美满生活犹如还在蜜月,不料王希文身染重病,医治无效,满腹遗憾地离开了人间。

苦自尝,守住门户,奉养公婆。于是她打叠精神,身兼内外,不嫌劳烦,把里里外外的事都料理得井井有条,博得乡邻亲友们的交口称赞。

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,张氏虽为女流,却颇具男子之风,有胆有识,遇事敢于决断,勇于作为,使某些原本觊觎她的家产的男望而生畏,不敢妄为。更兼她有和亡夫希文一样的仁性慈心,怜老惜贫,乐善好施,因此人缘极好,家庭的社会地位很高。

乾隆年间,山东北境各县连遭荒年,很多人家背井离乡逃荒要饭。一天,乐陵县的一个张姓中年男子,携带他十来岁的儿子源长,乞讨来到张氏门上。张氏见其父子饥寒交迫,便拿出饭食让他们充饥,并与之攀谈起来。源长的父亲言及妻子被饥荒夺去了生命,自己在无力抚养这个儿子,话语中流露出愿将孩子寄养于人,以免父子同填沟壑之意。张氏既同情他们的遭遇,又喜欢源长的聪明可爱,已有收为义子的念头。把话挑明之后,双方一拍即合,于是张氏禀明了公婆,就收留了源长,又拿出钱粮衣物赠与源长父亲,助他回家谋生。

自此以后,张氏一面服侍公婆一面抚养源长,把他视为己出,百般疼爱,为他聘请名师教他读书做人。源长这孩子也很有志气,不怕苦累勤奋攻读,不到二十岁即考取了秀才,接着乡试中举,会试连捷,被朝廷任命为御史。

张源长饮水思源,知恩图报,做官后首先为义母请得封赠,又亲自送上匾额,大书“松筠比德”,称赞义母节操如松竹般高洁。义祖父母亡故后,他奉侍义母百般孝顺,晨昏定省,嘘寒问暖,如赤子依依膝下,承欢取悦。张氏安富尊荣,尽享了晚年之喜。